在地點與自我之間
「AAA亞細亞安那其連線」
與國－族影像表現的幾種典範

文｜王柏偉

當前的全球化緊張情緒反映出了如下的現實：隨著民族國家，迄今為止盡最大可能的政治居住條件——似乎是民主的民族（或想像中的民族）——都將暫時停歇，[…]這曾經是民族國家了不起的功績，為其中絕大多數的居民提供一種家的感覺，它同時是想像中的或者現實的免疫結構。它可以被體驗為地點（Ort, location）和自我（Selbst, self）的趨同，從更好的意義上來說，是地區性認同的體現。

——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註1）

民族國家、全球化、世界史

德國哲學家斯洛特戴克從球面形態學（Spherology）的歷史考察出發，認為民族國家的興起、全球化與世界史（world history）三者乃是西元1492至1945年這個「大地全球化」時代的產物，因此必須放在一起考察，才能較為全面地理解「大地全球化」之後的「電子全球化」時代（註2）國族與地方認同的反撲到底所為何來，以及為何採取某種特定的形式。

斯洛特戴克指出，大地全球化時期民族國家興起的原因，就在於宇宙全球化時期對於「土地」的思維與大地全球化時期新型態的、個體化的「主體」理論結合（註3），將民族國家視為一個主體，並將主體的位置（也就是這個政體的象徵位置）放在主權者身上，土地轉化成民族國家的「領土」（被主體所占有的土地），成為斯洛特戴克所謂「族群的容器」。最明顯的例子表現在霍布斯（Thomas Hobbes）《利維坦》（Leviathan, 1651）一書封面的圖示上，畫面約區分成上下兩個部分，佔有畫面上半部3/5空間的巨大主權者內部被盈滿的人民所填充，下方2/5有著領地及其外廓（註4），主權者與領地兩者上下對應，具體展現了身心二元論與整體性（容器）之間的必要關係（註5），人民、主權與領土因而被認定為組成民族國家的三個必要（也就是實體性的）條件。斯洛特戴克認為，為了考察不同的全球化時代演化，我們可以將之抽象為「地點－自我－同一性（認同）」三元結構，並研究這個三元結構在不同時期不同的地區的表現形式。

對本文來說，我們將問題意識更縮限在台灣的範圍內思考：如果將台灣錄像藝術類的國族影像作品放在「地點－自我－認同」的軸線上來考察，我們有哪些典範？

主權者位置：「後民國」與「萬歲」系列

台灣錄像式影像處理歷史與政治情境並不早於1985年，而電子（電視、電影或電腦）影像正式以錄像藝術的方式回應社會變遷則是1988年以後的事情，縱使電影與電視已經進入台灣社會有些時日，但是在1988年前並未被錄像式影像視為可資利用的傳統，1988年王俊傑與鄭淑麗合作的〈歷史如何成為傷口〉首開先例，打開台灣錄像藝術以影像表現技法回應政治情勢的風潮（註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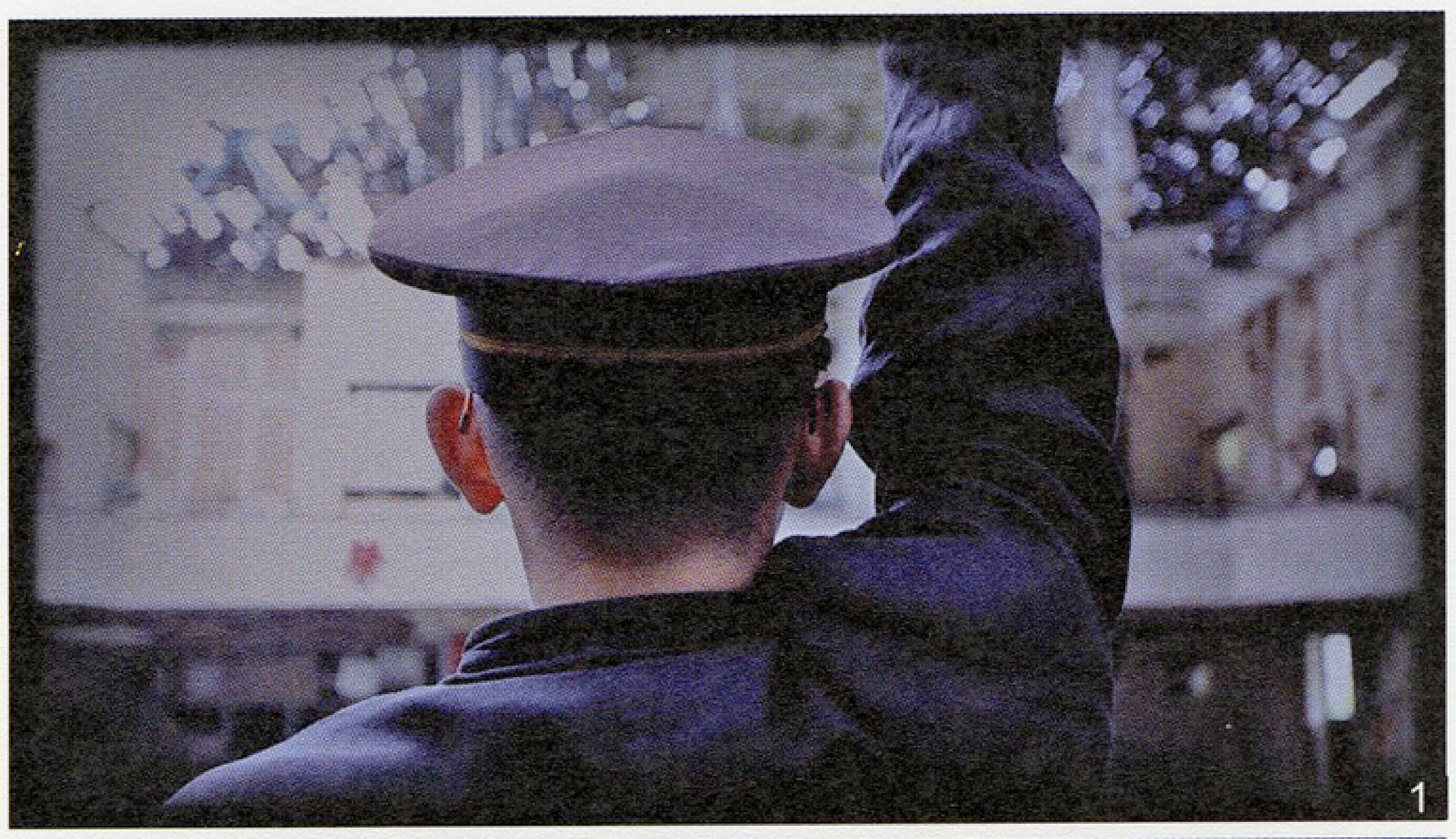
不過，〈歷史如何成為傷口〉這種以「人民」對抗「主權者」的作法必須被放在「後民國」的脈絡下才得以可能。之所以是「後民國」，就在於原本被宣稱能夠完整代表（全體）人民的主權者在1987年台灣解嚴之後，失去以國家暴力全力鏟除異己的合法性，無法被化約為主權者的、人民的利益及認知剩餘從此以「社會」之名脫離主權者形象的代理（註7），開始思考不同人際互動關係及集體行動的邏輯，甚至找尋與這些關係相應的溝通與表述方式，2011年「後民國」展覽正是在「社會與主權者脫鉤」的後民國時期重新探問主權者位置的表現型態。在「政治≠社會≠個體」的認知下，「主權者」並不必然要以個體的方式來加以表現，正是因為解嚴，人民開始認識到獨裁者式的政治體制展現了極權政體「以一人代表眾人」的荒謬性，並以負擔集體行動決策之功能的「組織」（也就是政黨政治意義下的「政府」）取代了「擬人化且個體式的主權者」（註8），國家（中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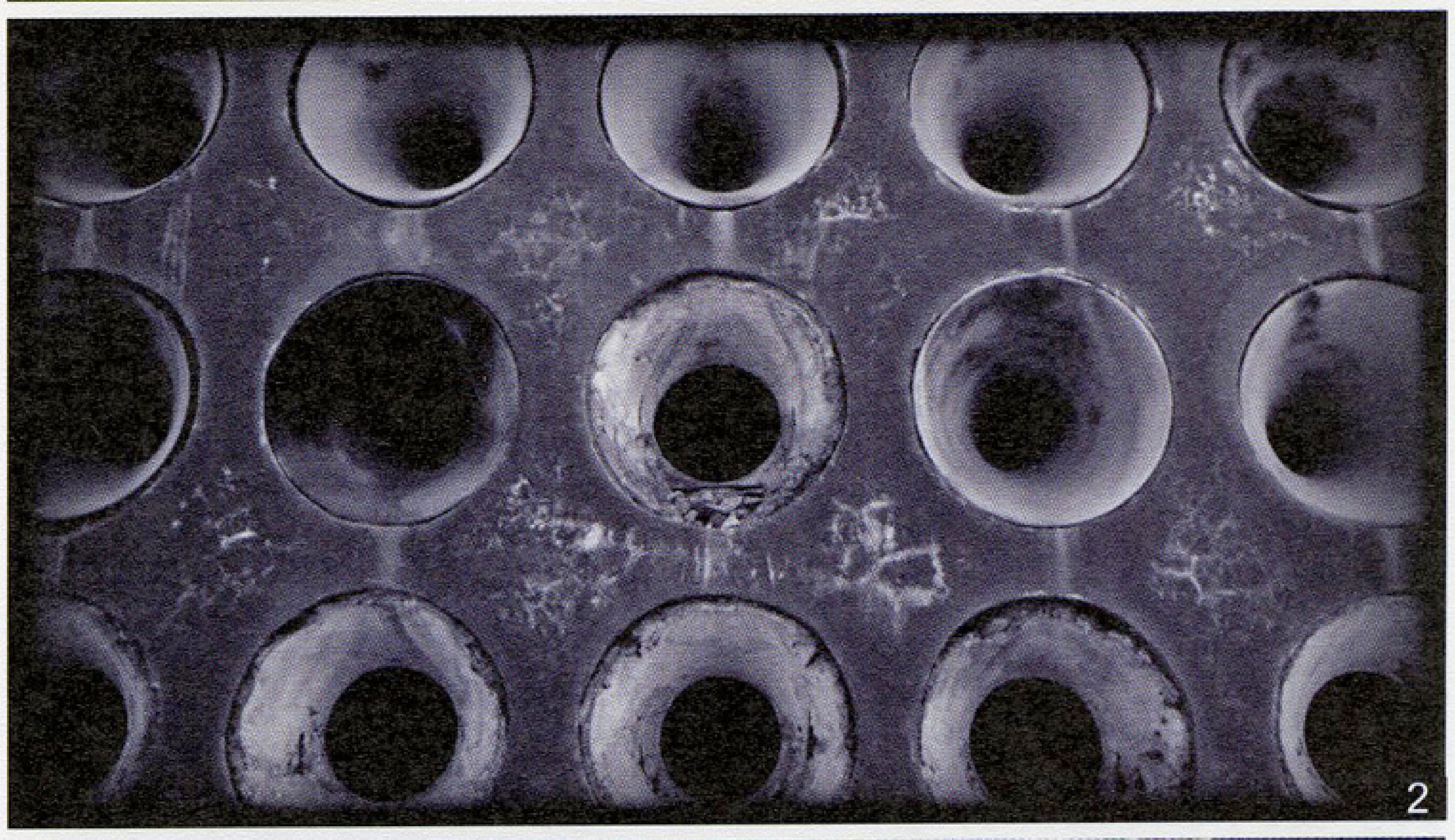
民國）因而必須重新發明非獨裁者式的象徵。「後民國」正是思考「中華民國」及其象徵物間關聯性的大型展覽（註9），「符號化的象徵」所佔有的可能性空間則是政體最主要的領地（註10），諸多代表不同機制與體制的符號彼此之間相互競爭主權者位置，希冀一統符號性的領土，並在這個位置上完成它（符號性自我）與體制的同一性而成為象徵，「後民國」展示的就是這種鬥爭的不同切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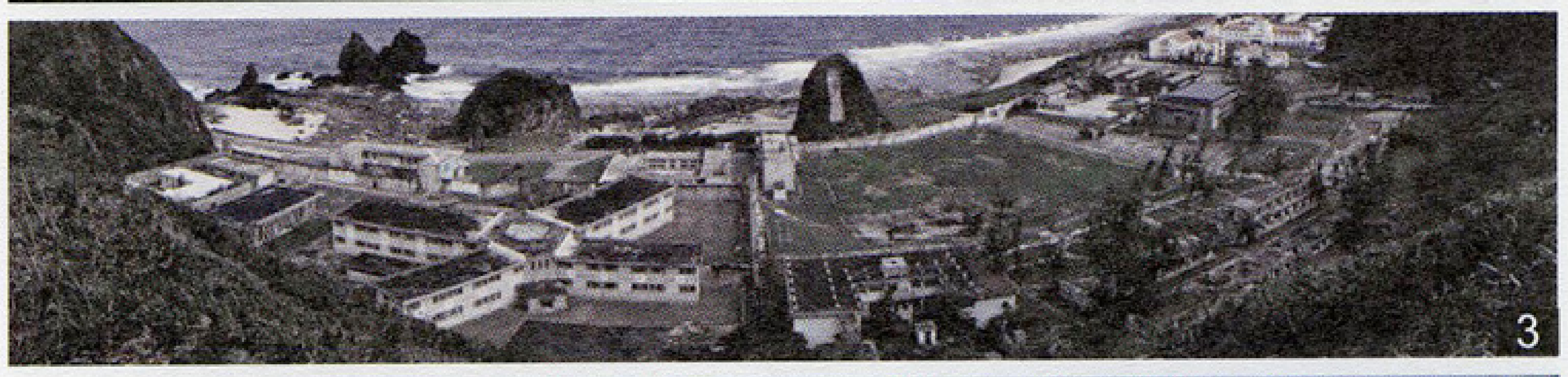
不同於「後民國」展覽是從政治體制及其象徵物的角度來思考主權者位置的問題，姚瑞中長久以來致力於開發極權政體個體式主權者的各種表現形式，特別是在獨裁者的「自我－認同」的軸線上提出了犀利的觀察。透過顯而易見指向蔣介石的打扮，姚瑞中挑釁了獨裁者（及其崇拜者）將自身等同於主權者自我認同的歷史情境，〈歷史幽魂〉以銅像與活人的對比指出「獨裁者個體＝主權者」這個認同等式是一種幽靈性的自我認同，為了將完成這個認同等式，獨裁者只好將自己向外投射到主權空間中，「巡視」成為幽靈學中「領地」概念的必要範疇。「萬歲」中的前線戰爭空間與〈萬萬歲〉中的後方政治犯監禁空間兩者，只有依賴到處巡視不斷移動來將幽靈肉身化，才得以一再縫合「獨裁者／主權者」間的斷裂，正是「在每個地點都縫合這個斷裂」的必要性，讓漂浮、佔領、挪移等等這些特定地點的行動產生強而有力的偏移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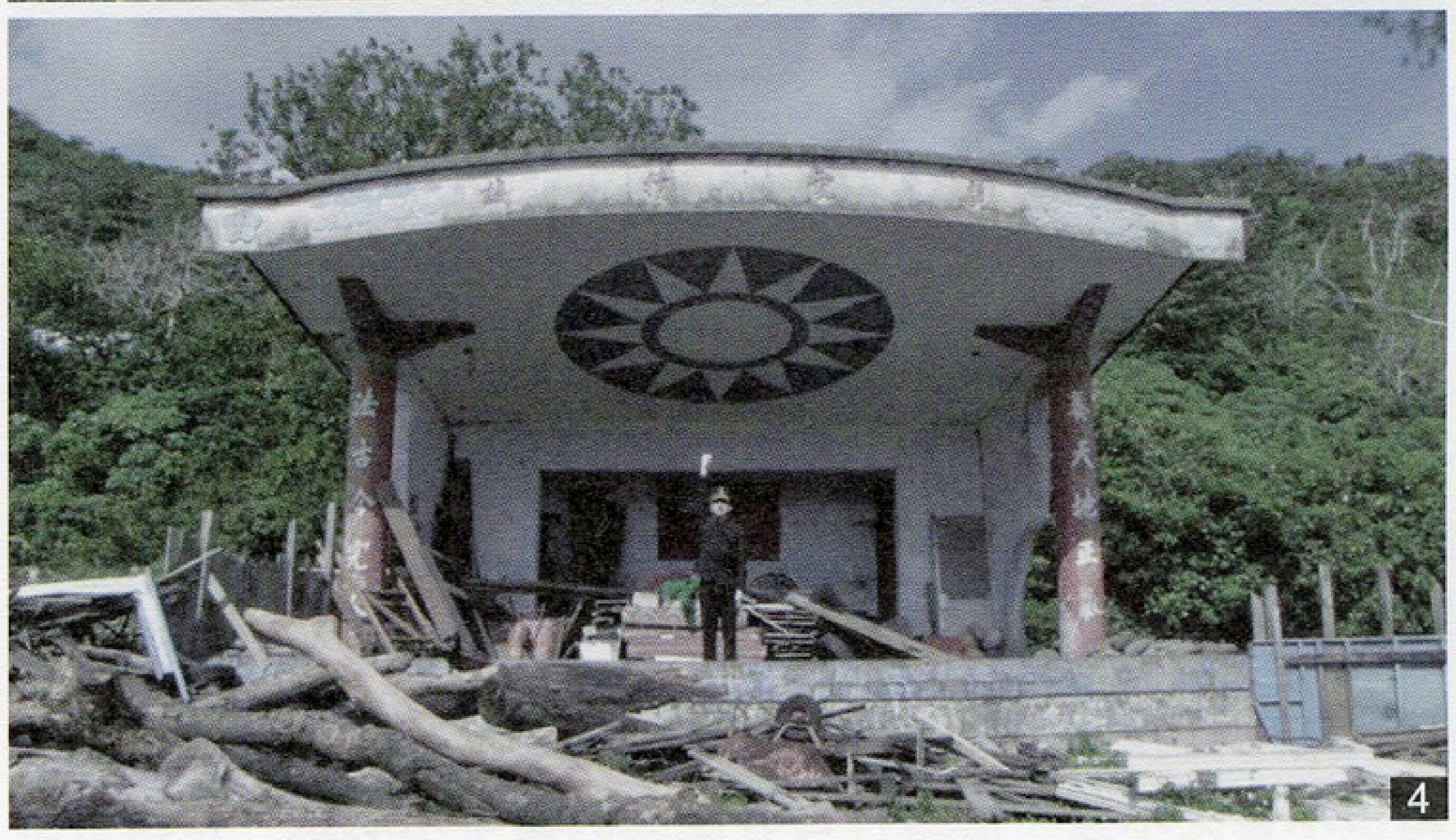
族群與歷史的生成：
「AAA亞細亞安那其連線」與〈路徑圖〉

斯洛特戴克認為，從電子全球化時代回頭省視大地全球化的時代，「領土」這種曾被認定為民族國家的必要元素，在當代已經變得並非絕對必要，斯洛特戴克以猶太族群為例，指出猶太教子民在歷史上長久以來就是以文字（經文）作為「自我生成的容器」，在溝通中（而不需要領土）就實現族群自身。正是如此，斯洛特戴克認為電子全球化的時


1


2


3


4

1～2. 姚瑞中〈萬歲〉　彩色單頻道有聲錄像
5分20秒　2011（圖｜姚瑞中）
3. 姚瑞中〈萬萬歲〉　彩色單頻道有聲雙屏投影
7分30秒　2013（圖｜耿畫廊）
4. 姚瑞中〈萬萬歲〉　彩色單頻道有聲雙屏投影
7分30秒　2013（圖｜耿畫廊）

代，除了「有地點的自我」之外，有著越來越多「沒有地點的自我」與「沒有自我的地點」，並認為「（族群性－）自我」在大眾傳播媒介之後以至社交性媒介（social media）的年代，以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的「族群風景」（ethnoscape）的模式繞過領土式國家（註11），在實體空間層面採取解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策略來塑造族群認同的作法越來越成主流，甚至這種議題式族群常常反過頭來針對高舉民族主義大旗希望河蟹爭議箝制人民表達意見自由的國家，表明其抵制收編的立場。「亞洲安那其連線」的發起人們非常象徵性地在海上簽署了一份聲明，反對國家與資本的領土政治，不同議題以島嶼式作品的方式在資訊汪洋中浮現，雖有自我卻不佔領特定地點。

陳界仁〈路徑圖〉一作的重要意義，就在於凸顯：在電子全球化的時代裡，世界歷史中來不及參與特定事件發生的人民再也不會來不及，族群性自我認同的產生不必然一定得依附在過往的領土決策。陳界仁在2006年與高雄港工人一同組織了一個象徵性的罷工行動，同時間回應1995年發生於利物浦並延燒至全世界的碼頭工人罷工行動，以及台灣（與全球）政府近年來的新自由主義統治。2006年與1995年之間的時空落差在電子全球化的時代並不是太大的阻礙，族群意識的形成不必然仰賴同時間身體性的在場；相反地，在溝通層面上個體意識對於議題的參與才是族群式自我認同生成的重點所在，時間層面上族群自我認同的延續性不像空間性領土是基於過往在場者的決策，在世界歷史中的位置才是族群式自我認同的戰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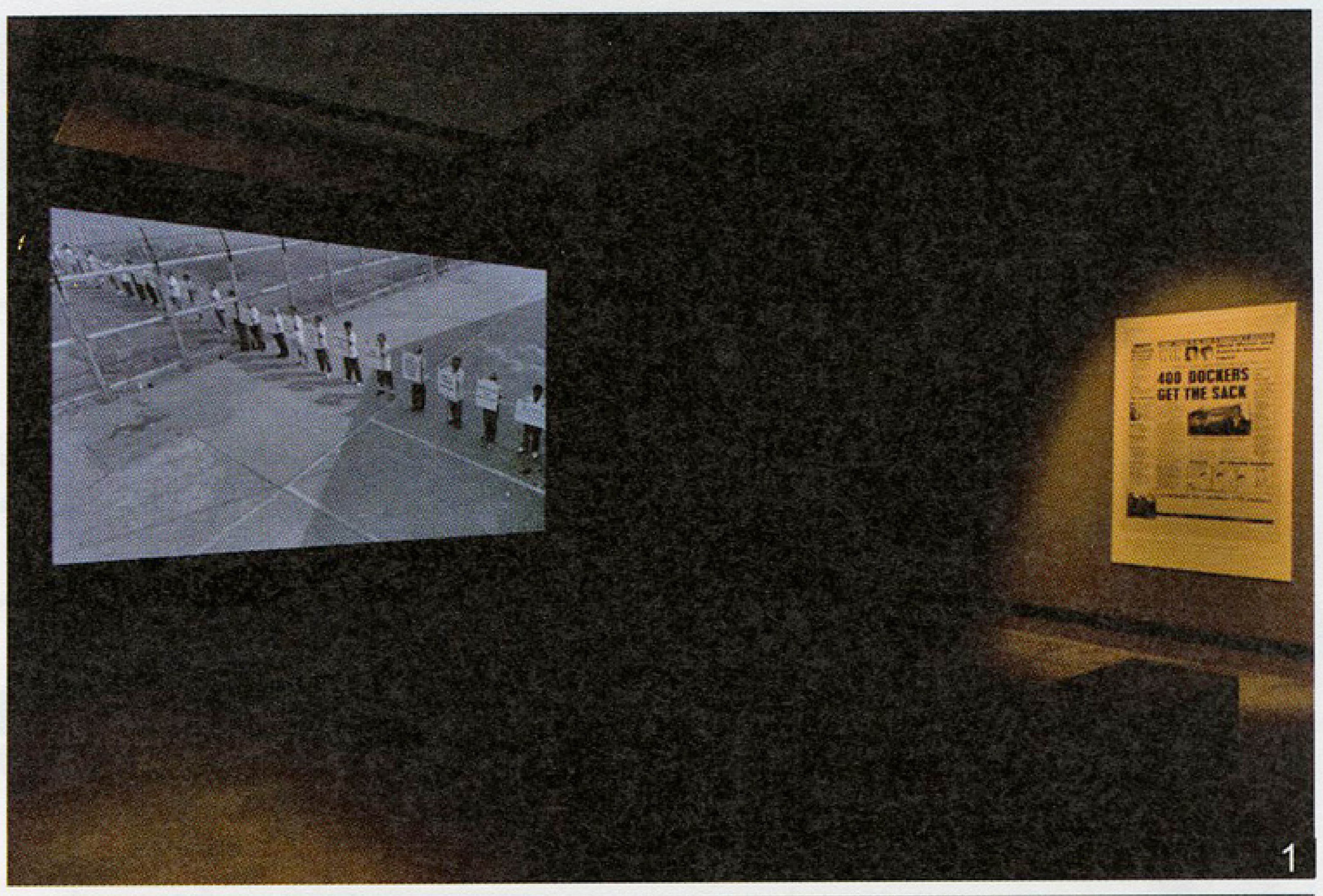
〈佔領第561小時〉與意識蒙太奇

不過，電子全球化時代自我認同的戰場是在世界歷史中找尋一個位置嗎？如果個體意識的參與是族群式自我認同的必要條件，那麼「意識」難道不是族群自我認同形成必須考慮的一個環節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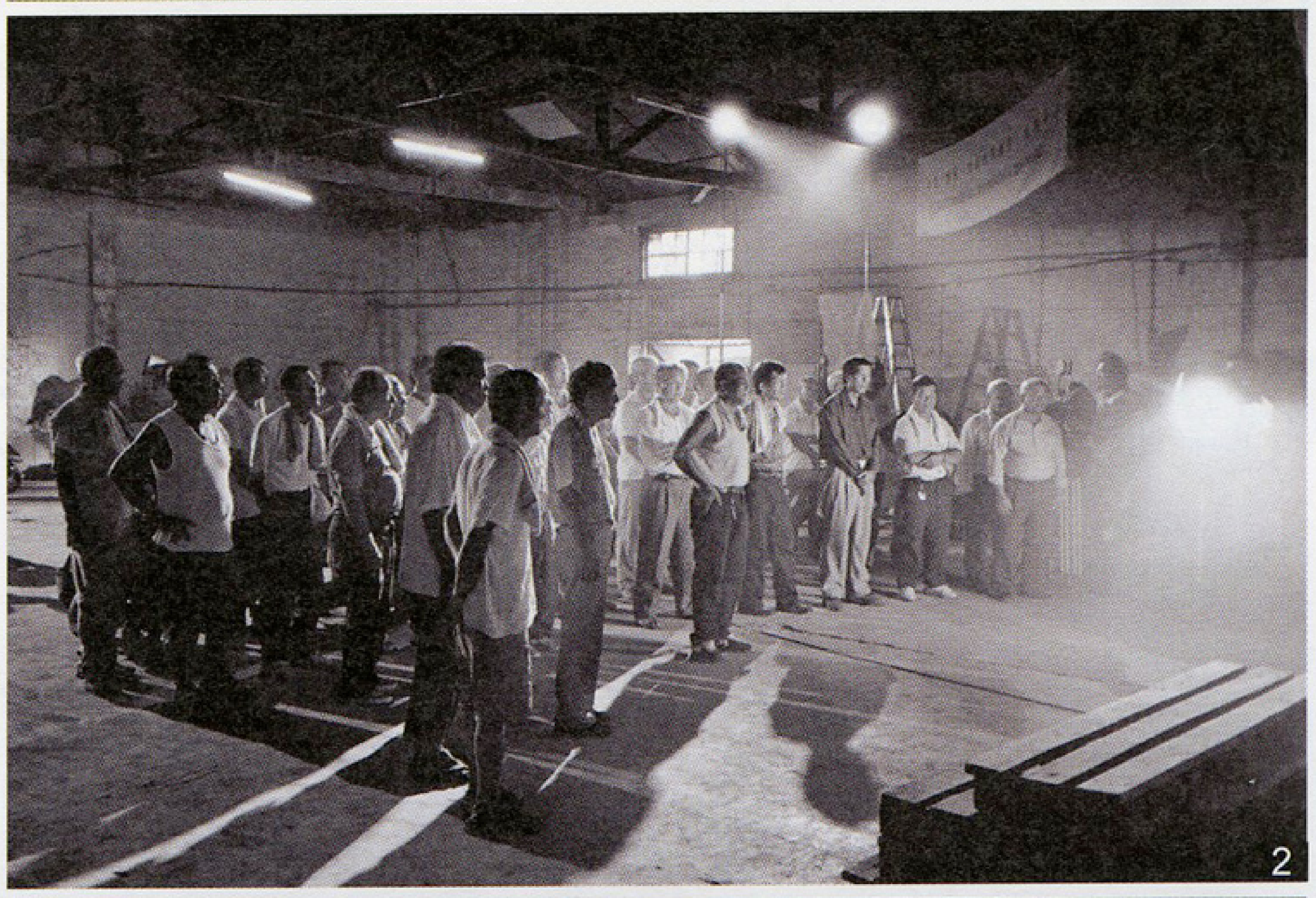
如果進一步考慮德波（Guy-Ernest Debord）的「景觀社會」與斯洛特戴克的電子全球化兩種歷史斷代方式，那麼我們不禁要問：從電影、電視到電腦與網路的大眾溝通媒介變遷是否會導致意識狀態的變遷？於此，史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給與了肯定的答案，他認為，在影像時代中「意識猶如電影」，只有一併考慮意識與電子影像的共作方式，才能回應自我與認同的相關問題（註12）。

袁廣鳴〈佔領第561小時〉一作拍攝於被太陽花學運佔領的立法院議事廳裡，在即將撤退的第561小時前後，攝影機以兩次來回的運動，滑過擠滿人潮的議事廳與學生離開後只剩相關物件的空間兩者。有鑑於立法院在民主法治國傳統下塑造國族自我認同的重要地位，〈佔領第561小時〉清楚地揭示了法治國中有效的「法律」必須依賴立法院加以制定所需的「地點＝空間＝（族群）容器」預設，正是這兩次攝影機來回中那些曾經存在卻又消失的學生身影，表明了「人民」這個元素在國族式自我認同與承載立法精神藉以實現族群生活的立法院兩者間，不必然具有實體性存在的現實；簡言之，人民（主權者）在他們賦予其權力以代理人民意志、實現國族式自我認同的立法院空間中不必然會被立法委員們放在心上。這次太陽花學運若非仰賴零時政府（g0v）以科技媒介突破立法院空間的封鎖線，並在臉書上形成強大的網路社群，引發人民參與這場公民運動的意識，激發國族式自我認同中「人民」這項元素的身體性在場與大眾傳播媒介中的意識現身，是不可能達成這麼強大動員效果的。〈佔領第561小時〉清楚地展現出「意識蒙太奇」（註13）與自我認同間的強烈關聯性，也是這次太陽花學運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萬歲」系列的幽靈領土學、〈路徑圖〉探索的世界歷史的位置、與〈佔領第561小時〉展現的意識蒙太奇，是這次「AAA亞細亞安那其連線」所提出的關於國－族影像表現的幾種典範。



1



2

3

4

註1： 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著，常洹譯，《資本的內部：全球化的哲學理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14，頁232-233。

註2： 斯洛特戴克從球面形態學的角度，認為全球化迄今的歷史演化進程是：宇宙全球化→大地全球化→電子全球化。相關的詳細討論請見Peter Sloterdijk, Sphären I: Blasen,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98., Peter Sloterdijk, Sphären II: Globen,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99., Peter Sloterdijk, *Sphären III: Schäume*, Frankfurt a.M.: Suhrkamp, 2004.

註3： 巴迪烏（Alain Badiou）認為，這種主體理論是笛卡爾式的，與馬克思（Karl Marx）、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之後的主體理論並不相同。我們或許可以在這裡以斯洛特戴克的方式指出，這是大地全球化時期的主體想像。

註4： 相關研究請見Horst Bredekamp, *Thomas Hobbes: Der Leviathan*, Berlin: Akademie, 2012.

註5： 我們在這裡跟隨斯洛特戴克，以球面形態學的方式，以「容器」來處理「整體性」與「同一性」問題。

註6： 關於台灣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期錄像藝術發展的歷史討論，請見王柏偉，〈從前適應性進展期到系統成立之初：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期台灣錄像藝術狀況概覽〉，《藝術觀點ACT》第59期，2014.7，頁27-34。

註7： 當然，在「人民」與「社會」並不必然等同，這也就是為什麼解嚴之後的十幾年內，有關「公民社會」（在政治的意義上：人民是公民）討論蔚為主流的原因，也是網路時代之後，「鄉民」具有強大政治意涵的關鍵之處。

註8： Niklas Luhmann, *Die Politik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Suhrkamp, 2000, pp. 228-273.

註9： 王柏偉，〈後民國在哪裡？〉，收於吳達坤編著，《後民國》，台北：田園城市，2011，頁32-41。

註10： 從拓樸空間的角度來說，符號化的象徵空間亦是真實空間，亦是領地。

註11： 這也是本文為什麼將影像表示為「國－族」影像的原因。

註12： 史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著，方爾平譯，《技術與時間III：電影的時間與存在之痛的問題》，南京：譯林，2012，頁40-176。

註13： 誠如布希歐（Nicolas Bourriaud）指出的，除了「物化」與「擬人化」，蒙太奇也是當代異質現實間連結的主要方式之一。（http://www.tfam.museum/File/files/01news/140221_2014TB/TB2014_press%20release_CH.pdf，截取日期：2014.6.30）

1～2. 陳界仁〈路徑圖〉　黑白單頻道無聲錄像（循環播放）、文件　16分45秒　2006（圖｜關美館）

3～4. 袁廣鳴〈佔領第561小時〉　單頻道HD高畫質錄像　5分鐘　2014（圖｜關美館）